

第1卷第4期, 2008年11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3, Fall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1, No. 4, November, 2008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国际问题

最糟糕的学术职业体系.....1

学位工厂：无声的危机

论学位工厂对学生和社会的危害性.....3

当腐败充斥了教育部.....5

清除尼日利亚的学位工厂.....7

国际化

全球化、国际化与大学排名.....9

美国高校的国际化是否在倒退?11

跨界高等教育的私有属性.....13

牙买加的发展目标与其《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15

中国：国内与国际问题

中国的跨国教育：挑战、关键问题和成功策略.....17

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9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21

印度的发展趋势

印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谨防特洛伊木马.....23

印度理工学院的种姓、阶层与质量.....25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美国区域性认证机构从事国际认证的经验教训.....27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29

重建阿富汗高等教育的努力.....31

新书简介.....33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最糟糕的学术职业体系

Philip G. Altbach, Christine Musselin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Christine Musselin: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 (Sciences Po) 组织社会学中心 (Center for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主任; 电子邮箱: c.musselin@csocnrs.fr

成功的大学和学术系统需要合理的学术职业体系, 以便提供稳定的学术生涯、吸引优秀的人才、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淘汰不适合学术工作的人。许多国家的学术职业体系功能失常, 发展趋势令人不安。说句反话, 我们想建议对糟糕的学术职业体系进行排名。正过来讲, 我们的论点是: 没有吸引高水平教师、奖励高效率、提供稳定工作的学术职业体系, 大学将不可能实现高水平教学和创造性科研的使命。

“出租车教授”和非终身教职系列

有若干例子说明, 设计拙劣或执行糟糕的学术职业体系将对大学教师这个行业、甚至最终对高等教育的未来, 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大学系统是世界领先的, 认为美国教授在学术上是高产的。美国“非升即走”(up-or-out)的终身教职制度, 被看作是一个虽然很严酷但很有效的方法, 在确保审慎挑选的同时, 也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虽然人们批评这种制度弱化了教学、有时对初级人员强加了不切实际的时间限制, 但这种制度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现在的问题是, 在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新教师岗位是传统的“终身教职系列”, 大部分新教师要么是兼职合同工, 要么是全职合同工。虽然顶尖高校的情况稍好, 但这种新的制度使有关教师无法具有学术生涯。虽然这项政策可以在短期内节约开支、增加灵活性, 但它将会对美国的学术职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包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学术界变得日益困难, 在青年教师创新和创造能力最佳的时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阿根廷的学术职业体系可能是最不合

理、最复杂的。虽然阿根廷绝大多数的大学教师都是工资低的兼职教师(被称作“出租车教授”), 但是那些少数全职教师也面临着一个奇怪的职业发展路径。如果一个教师希望升到最高级别的学术岗位, 那么他(或她)必须服从“竞争”规则, 即这个已经被占据的岗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申请者开放。换言之, 这些教师不会因其表现而被自然提升, 而是不得不与其他申请者争夺这些岗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该系统往往效率低下得无法组织“竞争”, 因此原本就在这个岗位的教师也得到了提升。不用说, 阿根廷的这个竞争制度对大学教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阻止了很多人进入该职业或者申请晋升。

欧洲的反常情况

在法国, 获得第一个终身职位——讲师(maître de conférences)的年龄要比其他的国家早很多(平均在33岁之前), 从此就开始了35-40年的学术生涯。在获得这样的岗位之前, 要经历一段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因为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开放给每个博士的岗位比例都在减少, 并且博士学位都还没有被商业和公共部门认可为入门资格。因此, 聘任一个新的讲师是个风险很高的决策过程。但是目前大学院系大约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审核候选人, 选择其中的一些人进行20-30分钟的面试, 然后选出其中最好的。尽管名单上的第一候选人顺利通过了竞争异常激烈的挑选过程, 但是聘任这个讲师的大学并不指望他。这些新讲师的待遇很不好, 不仅工资待遇是根据低于法国人均GDP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确定的, 而且通常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可能会被要求去从事其他同事不愿做的教学

工作, 或者被要求做行政事务。在经过重重困难获得博士学位后, 所找到的工作却如此令人失望, 破坏了这种职业吸引力。

在德国, 获得一个稳定职业的年龄要比法国晚得多, 第一个终身职位——教授的平均年龄在42岁。从博士到教授, 大部分年轻教师有很多年都在学术中层(Mittelbau)的岗位上, 即担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或其他职位。成功地渡过这一漫长且期限不定的学徒生涯后, 就成了有自主权的教授, 可以对助手的岗位数量进行讨价还价, 像他们在学术中层时期所见到的教授那样工作。2002年进行的改革有若干合理的原因, 旨在反对长期学徒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提高学校对教授的控制。对于所有新教授, 大学都开始采用以工作绩效为基础的工资制度。他们被聘为教授时所确定的工资待遇会持续3-5年时间, 然后根据其表现重新协商确定新的工资待遇。然而, 大多数教师发现新的收入制度不如以前的那么令人满意。除此之外, 这项改革为青年教师创造了准终身教职岗位(quasi tenure-track positions), 因此这些青年教师就变得更加独立于资深教授。

目前判断这种新的职位是否会使得晋升为教授更加容易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这种新的职位还不到800个。这种转变可能会打击那些还处在传统中层岗位的教师, 他们现在仍然受到教授们的控制, 但他们知道当自己成为教授后, 现有的长期学徒制可能会被新的自治型学徒制取代。此外, 教授们可能也面临着收入缺乏吸引力的问题。

包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仍然保留着一项制度, 即要求教师在获得最高学术职位之前, 要完成第二篇博士

论文。这就增加了职业生涯中期所面临的压力。该制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可能是有效的, 但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且受到了广泛批评。

结论

由于难以确定哪一个学术职业体系最糟糕, 我们不愿意做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排名, 但确实有很多体系非常糟糕。事实上, 全球的发展趋势表明, 通往学术生涯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缺乏吸引力。这种状况将不利于世界各国大学的提高。如果一个学术系统或一所大学要获得成功, 它需要实施一种有效、公正、透明的制度, 确保学术生涯是可能的, 确保通过一个既专业又透明的招聘过程吸引学者, 确保实行一个可以根据工作绩效进行奖励、能够做出适当选择的评价体系。进入学术职业的学者, 需要获得一个明确且可实现的职业生涯路径, 并能保证高水平的表现能够带来工作的稳定与成功。在这个过程中, 程序必须严格且唯才是用。与此同时, 评价制度绝不能过于复杂。学术系统内的流动性是人们希望拥有的。包括教学、科研、服务于大学和社会在内的各种学术表现都必须被评估, 尽管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可能因具体学校的使命而有所不同。职业的稳定性和学术自由必须被保证。美国式的终身教职制度发挥了这一作用, 但也有其他制度具有这种作用。评价制度当然必须考虑到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学术职业体系功能严重失调的大学和学术系统, 将发现自己难以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里获得成功。

论学位工厂对学生和社会的危害性

Judith S. Eaton, Stamenka Uvalic-Trumbic

Judith S. Eaton: 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主席; 电子邮箱: eaton@chea.org

Stamenka Uvalic-Trumbic: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局改革、创新与质量保证部门主管; 电子邮箱: s.uvalic-trumbic@unesco.org

学位工厂正在妨碍为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所付出的努力, 这曾经只是国家内部的大问题, 但现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应对这种潮流, 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最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聘请高等教育和质量保证/认证方面的领导人共同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组织, 致力于解决学位工厂问题。

学位工厂的特征

学位工厂是指虚假的甚至诈骗性的高等教育或培训机构, 它们提供可能被认为是伪造的学位或证书。乍一看, 学位工厂就像一所常规的学院或大学, 它们也有纸制的或电子的宣传册, 上面印着非常吸引人的校园设施、彰显历史传统的徽标、令人印象深刻的师资队伍。然而再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那些所谓的“校园”不过是个邮局信箱, 徽标则是在其他著名学校徽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而来的, 师资名单里的优秀教师不过是些“可能”某个时候来讲讲课、但却不属于该校的专业人士。

虽然没有单一的、被普遍认可的定义, 但大部分学位工厂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其学位可以购买; 极少或者不要求课堂出勤(现场或者远程); 学生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很少, 毕业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 学位授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申请者的个人简历或生活经历, 而这些文件或许并不真实; 这些学位工厂可能并没有国家的开办许可或经营权; 它们的名字可能故意取得与某一知名高校极为相似; 为了增强可信度, 一些学位工厂甚至滥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名称, 佯称得到了这些机构

的认证; 但是那些能够真正证明学术质量的证据, 通常是经过公认的认证机构认可的证书, 则可能是没有的。

以现场和邮寄为基础的传统授课方式使学位工厂只能在区域或者国内运行。但是现在, 学位工厂积极采用基于网络的授课方式, 使得它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在全世界活动。出口学位工厂的往往是一些发达国家, 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进口国则常常是一些毫无防备或者并不情愿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很难统计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学位工厂, 对这些学校总数和运作范围的估算应非常谨慎。每年学位工厂所涉及的资金范围应该至少在五亿到数十亿美元之间。

学位工厂的危害

学位工厂造成的社会危害巨大, 因此高等教育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承担起打击这些机构的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但包括学生, 还包括用人单位和国家政府以及高校自己。

无论是处心积虑地寻求学位获得捷径的学生, 还是受到虚假广告误导的无辜学生, 都会成为受害者, 因为经常是他们支付了昂贵的费用, 换来的却是伪造的或者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处的学位证书。受国外学位的诱惑, 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及其父母尤其容易上当受骗。可事实上, 那些证书常常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或者提升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学位工厂获得的学分不能很方便地转换成合法高校的学分。如果某个学士学位被证明是伪造的, 则不能凭其申请研究生入学机会。

用人单位无意中根据伪造的学位信息招收了员工后, 就会受到损害。持有这样学位

的雇员，最起码会非常地困窘。更有甚者，如果持有伪造学位证书的人从事的是护理或者工程等事关他人性命的职业，则会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

当国家把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收入以助学金或贷款的形式用于支付这些学位工厂的学费，或者政府作为用人单位为其入读这些学校的员工提供学费补助时，也会因此蒙受损失。政府也有义务承担起执行治理学位工厂法规的费用，例如由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政府问责局(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全美共同进行的学位工厂调查。

高校受到损害则是因为他们提供合格高等教育的合法事业遭到了破坏。当学位工厂通过细微的改动盗用那些可信赖高校的名称时，就会在未来的学生和公众中造成混淆和怀疑情绪。公众会因为对学位工厂的不信任而质疑合法的高校，使那些值得信赖的高校为获得社会信任和服务公共利益而付出的努力大打折扣。

国内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遏制学位工厂的重要措施，包括公布合法院校的名单、出台禁止成立学位工厂的法令、关闭已经成立的学位工厂、支持告知和唤醒公众的活动。在上文提到的讨论学位工厂问题的会议上，来自尼日利亚、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打击学位工厂的措施和经验。

各国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还包括：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认可的外国高校名单，并规定外国高校在中国办学必须与中国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英国建立了面向公众的学位工厂警告系统，同时提供关于学位授予权力和大

学名称是否达到国家标准的咨询。尼日利亚禁止未经国家认证的机构授予网络学位，用人单位不应该雇用持有伪造学位证书的员工。在澳大利亚，“大学”这个名称是受到保护的。

国际措施

随着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最近对学位工厂的关注与高等教育质量工作紧密相连。作为对这种现象进行预警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海外留学》(Study Abroad)一书中，公布了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2003年给出的学位工厂和已获得认证机构的清单。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联合发布了《跨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指南中提出了各种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在保证跨界高等教育的质量、抵制学位工厂方面的任务。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开通了一个实验性的门户网站(Portal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portal/hed-institutions>)，该网站可为用户提供查询各国合法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通道。没有出现在这个网站上的机构可能就值得怀疑。

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的国际小组正致力于形成一份解决学位工厂问题的有效文件。该组织还在探索其他的战略举措，比如是否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国际计划来处理学位工厂问题，以及旨在提高公众意识的国际行动的可行性的问题。

这样的国际计划是长期需要的。学位工厂的存在将继续危害学生、用人单位、政府和高等教育。它们使每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处于危险之中，会损害多样化、高效率的高等教育事业及其学生群体的利益。

当腐败充斥了教育部

George D. Gollin

美国伊利诺大学物理系教授、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美国）董事会成员

电子邮箱: g-gollin@uiuc.edu

教育和个人经济优势之间的联系推动了高等教育全球市场的发展。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并不能以相应的速度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来满足这一要求。学位工厂，即向那些希望轻易就能获得文凭的人出售伪造学位的机构，是屈从于市场力量的反面产物。最近美国一学位工厂的倒闭为我们提供了洞悉这些恶劣现象的机会。

贿赂高官

2002年，理查德·诺瓦克(Richard Novak)到华盛顿特区去贿赂一位外交官。也许是他曾经作为亚利桑那州汽车销售人员的经验帮助了他：他说服了利比里亚大使馆的副参赞阿卜杜拉·邓巴(Abdulah Dunbar)以2,250美元将利比里亚的大学认证出售给了“圣瑞吉斯大学(St. Regis University)”，远远低于邓巴一开始4,000美元的要价。这第一桩交易为美国圣瑞吉斯大学这一学位工厂的拥有人迪克西(Dixie)和史蒂夫·兰铎(Steve Randocks)打通了不断用金钱贿赂利比里亚官员的渠道。

当时利比里亚仍处于血腥内战的末期。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8岁，婴儿死亡率是15%。利比里亚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已被摧毁。兰铎假装要在这个几乎让人绝望的国家引入3所大学：圣瑞吉斯大学，罗伯茨敦大学(Robertstown University)和詹姆斯门罗大学(James Monroe University)。他们在网站上建议客户联系华盛顿的邓巴或者利比里亚驻加纳大使馆的安德鲁·柯洛阳(Andrew Kronyanh)，以确认学校的合法性。这3所学位工厂都宣称自己的校园在蒙罗维亚(Monrovia)，照片显示这些学校有美丽的建筑和广阔的牧场，但照片上的地方其实是布

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出生地。

控制利比里亚教育部

2003年6月，邓巴因为涉嫌收受圣瑞吉斯大学的贿赂并为其作担保而被利比里亚大使馆开除。两个月后，兰铎将诺瓦克和邓巴送到非洲，旨在让邓巴重新获得合适的政治职务。兰铎一伙人顺利达成了目标：邓巴几个月后以利比里亚大使馆首席参赞的身份重返华盛顿。

2003年底，兰铎一伙人已经控制了被利比里亚教育部承认的高校清单以及利比里亚大使馆的网站内容。通过其官方认可的机构“全国教育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他们将利比里亚的认证直接出售给其他学位工厂，比如“南太平洋大学(Southern Pacific University)”和“美国海岸线大学(American Coastline University)”。牵涉在内的利比里亚官员包括至少两名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一名司法部长、一名外交部长、利比里亚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的两任主任，以及许多其他外交人员和政府官员，其中若干人都是教育部成员。

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大学！

一年以后，兰铎一伙人扩大了产品内容，包括制造学位工厂。他们对外如此宣传：“你想通过拥有网络高校获得百万美元的收入吗？……我们的专家可以为你实现梦想！”他们告诉潜在的客户其专家顾问与某政府权力人士建立了一种长期合作关系，这将大大缩短建立一所新学校的手续办理时间或者缩短为已建立的学校得到合法认证的时间。

2005年7月, 诺瓦克前往华盛顿特区会见了有意为鲁道夫·阿狄森·戴维斯技术大学(Randolph Addison Davis Technical University)购买认证及其他服务的三位客户。四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 邓巴(毫无疑问, 他就是所谓的“某政府权力人士”)开始讨论他所提供的服务的费用。但这些客户其实是美国特工, 而这桩生意只是个计谋。

圣瑞吉斯大学的下场

一个月后, 联邦、州和地方当局搜查了圣瑞吉斯集团在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华盛顿州的7个据点, 没收了电脑和伪造学位的工具。在那之前, 兰铎一伙人已经将数千份文凭卖给了全世界的客户。他们甚至盗用“托马斯·卡珀”(Thomas Carper, 特拉华州的一位参议员)的名字, 佯称其为圣瑞吉斯大学的校长。很多被兰铎印制在文凭上的、所谓获得行政认可的大学, 其效力确实等同于合法的利比里亚大学。

诺瓦克、兰铎团伙以及其他5名被告于2005年10月被指控犯有一系列刑事罪名, 包括通过电子邮件和通信手段进行欺诈、洗钱和贿赂外国官员。圣瑞吉斯网站的主人肯尼思·佩尔森(Kenneth Pearson)几个月后还因儿童色情收费再次受到起诉, 圣瑞吉斯的服务器上还有成千上万张色情图片。到2008年4月, 所有8名犯罪嫌疑人都选择主动认罪, 而不是面对陪审团的审判。

具有学位授予权并不能保证学位的合理性。圣瑞吉斯是一所正当的大学吗? 当然不是。没有班级授课的形式, 兰铎所有从事文凭证书制售工作的员工都只有高中毕业。兰铎从某一负责利比里亚大学认证的官员手中

购买了“认证”的事实, 并不能改变学校的性质。

但是, 获得利比里亚的认证是不是确实给了圣瑞吉斯大学合法的学位授予权呢? 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兰铎出售的是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文凭, 但从未获得过这两个州的授权。如果圣瑞吉斯将其服务器和组织管理机构转移至利比里亚或加纳的话, 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它可能还是学位工厂, 但可以根据利比里亚法律运营。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不同的州根据不同的标准颁发学位授予权。比如阿拉巴马州高等教育厅有时在对私立大学的行为没有足够关注的情况下, 就给它发放开办执照。一个拥有这种执照的组织声称已获得“认证”, 但这个“认证”是由该组织的所有者开办的认证工厂提供的; 这个认证工厂还给伪造的医学院颁发证书。在获得阿拉巴马州的执照之前, 这个人曾与兰铎集团合作, 因此他的客户可能从两个学校都获得文凭。

对于学校的合法性来讲, 由政府部门赋予学位授予权是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任何有关跨国学历认可的国际协议, 都必须考虑到由“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区别所导致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问题。不断变化的情况很可能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家的稳定造成威胁, 这使得那些政府盯上了学位工厂的运营者。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提高高等教育能力的迫切需求而产生了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对学位工厂极具吸引力。国际高等教育界有责任通过审查手段和数据库的建立来解决这个问题。

清除尼日利亚的学位工厂

Peter Okebukola

尼日利亚克劳福德大学 (Crawford University) 理事会主席

电子邮箱: pokebukola@yahoo.com

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系统拥有 297 所高校 (包括大学、理工学院和教育学院), 在校生 350 万, 是非洲规模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个曾经倍受尊敬的系统如今却黯然失色, 造成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学位工厂问题。一些不惜任何代价想要获取文凭但又缺乏进入被认可高校基本入学条件的人, 是学位工厂的学生来源之一。另一个学生来源是大学入学考试中的落榜生。2008 年, 一百多万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中, 估计有 80% 会选择这一途径。持有这些学位工厂学位的人, 因为在自己宣称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域缺乏应有的知识和技能, 而遭到私有和公共部门雇主的谴责。尼日利亚希望在 2020 年之前进入全球前 20 名经济体的愿景, 将因为这批不合格的毕业生而大打折扣。这就是政府为什么厌恶那些学位工厂并取缔它们的原因。

在尼日利亚, 主要有四种形式被认为是学位工厂, 包括本土和国外大学设立的未经批准的分校, 获得批准的大学设立的未经批准的附属机构, 大学开设的未经批准的专业以及国外流氓机构提供的网上课程。从 1995-2001 年, 这些“害群之马”每年生产的“毕业生”约占尼日利亚大学毕业生总数的 15% 左右。2001-2004 年, 其“毕业生”产量急剧下降, 在 2005-2006 年又有了轻微的上升。到 2007 年, 作为大学监管机构的全国大学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 大大减少了这些机构及其在校生的数量。全国大学委员会一系列打压制裁活动预计将有效控制学位工厂的活动。

实行限制

在过去的 9 年中, 为了根除学位工厂采

取了一系列行动, 其中 7 个行动值得关注。首先, 1999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n Education) 颁布了一项国家政策。这一最高决策机构指示关闭所有本国和外国大学的分校。事实证明, 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在高等教育中清除学位工厂是个很有效的措施。

第二个战略措施是实施强制制裁。全国大学委员会直到 2001 年才执行关闭分校的政策。在政府这场引人注目的突然行动中, 全国大学委员会在防暴警察 (受总督指示) 的帮助下采取措施, 关闭了非法校园。这场行动的成功率接近 90%, 因为个别学校现在又开始秘密运营。2002-2005 年, 学位工厂的数量和活力明显下降。

第三个行动是确定已获批准专业的承载力并要求学校强制执行。承载力指在培养合格毕业生的过程中, 现有的资源最多可以支撑多少学生在学。这一监管措施确保大学不再通过非法途径招收额外编制的学生。作为制裁措施, 招收额外编制的专业将被全国大学委员会取消。

第四, 全国大学委员会与国家服务局 (Department of State Services, 尼日利亚的特务机构) 进行合作, 共同查找、逮捕和起诉未获批准的大学及其分校的经营者。第五个战略措施是由全国大学委员会执行秘书在全国的电子和印刷媒体上公开非法高校的名称。学生、家长和雇主已经开始躲避这些学校。随着客户的逐渐减少, 这些学校也将逐渐消失并被遗忘。

自 2007 年以来, 作为打击学位工厂中最关键的第六个措施, 全国大学委员会指示所有得到批准的大学公布其全部专业的清单。委员会随即进行资源核查, 对那些满足专业

设置最低学术标准的专业给予正式认可。这些专业将被列入尼日利亚大学系统的已获批准专业目录(Directory of Approved Programmes)中。由于网上和跨国专业还没有得到国家政策法规的认可,目录的出版作为第七个战略将排除学生有可能感兴趣的学位工厂。

我们是否已经赢得这场战斗?

2008年5月5日,全国大学委员会宣布关闭10所非法大学。这一行动缩减了学位工厂的队伍,也警告了那些全国大学委员会接下来将要予以关闭的机构。此外,2008年5月,专业认证的扫尾工作是全国大学委员会消灭学位工厂的另一重要举措。

在过去三年中,由大学毕业生参与的全

国青年服务团计划(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 Scheme)进一步加大了对学位工厂和未经批准专业的鉴别力度。总体上来看,这些努力使得清除学位工厂的斗争的成功率提高到了70%左右。

小结

学位工厂因为大量的绝望学生和一味追求利润的供应商而滋生蔓延。虽然尼日利亚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前面两者的处境变得尽可能艰难,但是我们仍旧无法保证尼日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全消灭文凭工厂。越来越多的落榜学生和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获取文凭的人,使得上述保证非常不现实。然而,我们坚信全国大学委员会将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继续为清除学位工厂而斗争。

全球化、国际化与大学排名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科研主管、研究生院院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最近,《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8年7月3日和10日的两篇文章、《高等教育纪事》2008年7月11日的一篇文章,都对经合组织国家面临的国内人口变化可能会很快引发高等教育危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前两篇文章提醒英国的大学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后一篇则讲述了日本的大学如何通过“把招生工作者送到高中去、为潜在的学生举办校园参观活动、建设游泳池及改造图书馆、以及招收更多的外国学生”来应对不断升级的竞争。随着高等教育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获得更多份额的关键,被日本的《读卖日报》(Daily Yomiuri)称为“抢夺学生”、被《经济学家》称为“智力争夺战”的现象正日益普遍。事实上,现在对人才的争夺是对传统的自然资源争夺的补充。政府希望通过国际化抵消国内的人口变化,而国际化曾一度被认为是一项文化交流政策。测量高校对人才吸引力的排名现在越来越重要且受欢迎,反映出了全球竞争的态势。

以下内容是基于2006年对高等教育领导人进行的一个国际性调查和2008年在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高校中的访谈而成。

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学和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化被看作是全球竞争力的标志,还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确保世界科学发展参与能力的途径。根据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国家从留学生对国内研发的贡献中受益,而那些留学生数较少的国家则发现“难以……利用这些外部资源为本国的人力资本生产服务。”

日本的726所大学以前受地理位置保护,完全没有受到竞争的影响,但现在却面

临相当大的压力。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日本18岁的人口已经从1992年的205万下降到2007年的130万,2009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下降到121万。据《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7年6月21日的报道,日本近1/3的四年制大学未能招满学生,还有一些大学现在已经关闭。日本政府已经确定了把留学生人数从目前的10万增加到2020年30万的目标。

德国面临着类似的人口挑战,最大的影响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出现。联邦政府预计,即使每年有20万的移民,德国的人口还是会从目前的8,250万下降到2050年的7,500万。由于德国本科、研究生入学人数的下降,招收留学生现在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澳大利亚面临着另一种困难。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额达125亿美元,是继煤炭和铁矿石之后的第三大出口产品,其中高等教育占教育出口的一半。这点既值得庆祝,也很让人惊恐。这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但也揭示出澳大利亚过度依赖留学生,而诸如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留学生出口国都正在迅速扩大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的留学生比例全球最高,达到17.3%,超过经合组织6.7%的平均水平。但在澳大利亚就读学术型研究生专业的留学生比例是17.8%,落后于其他有竞争力的大学(它们的比例接近50%)。这种差别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博士生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关键人才。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改变了学生签证要求,使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永久居留权。

排名和留学生

澳大利亚、德国和日本的情况很好地说

明了全球大学排名是怎样成为人才争夺战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下面是对各国情况的简单对比:在上海交大2007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有2所澳大利亚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根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大学排名,有8所澳大利亚的大学进入前100名。在两个排名中的前100所上榜学校中,德国分别有6所和3所,日本分别有6所和4所。尽管有这样的成就,但这三个国家都希望保持本国在吸引留学生方面的竞争力。

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是全球性大学排名的用户。几乎毫无例外,所有受访的研究生都表示他们使用排名选择学校,或者在具体的国家里选择学校。例如,他们“可能了解澳大利亚,但不知道去澳大利亚的哪所学校”。大学排名反映了家人、朋友和潜在雇主都看重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代表着自豪和尊严。这对被作为主要争夺对象的亚洲学生尤其重要,他们可能在毕业后回祖国找工作。一名学生解释说:“在我们学校,我有一个同行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已经拥有很高的地位。虽然大家没有坦白地告诉我,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想法:如果我是从本校毕业的,我不可能得到像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那样高的地位。”

现在本科生的留学市场正在扩大,但大部分本科生都只是在外国学习一学期或一年,作为本科学习的一部分。在他们决定去哪个国家留学时,也经常受学校声誉的影响。

声誉、知名度和品牌

高校领导人及其招生办公室人员都非常清楚,排名是学校战略定位的重要部分。排名中的好名次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有利于品牌建设。高校领导人认为排名提高了学校在国内外名气,特别是在那些对本校有兴趣的留学生、雇主和其他高校。高校在竞争好的排名名次,许多高校从排名中获利,排名有利于克服当地的偏见或传统。

反过来,政府和高校正在建立先进的市场营销和招生策略拉拢优秀的学生,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资金和奖学金套餐,以及其他好处(例如经济援助、可以挑选专业等)。根

据2006年的国际调查,几乎50%的高校都使用自己的排名名次进行宣传,比如在校的网页和演讲中,在新教师培训和新生入学指导时,在国际会议上,或者在游说政府时:“以国际视野考虑问题的学校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些排名、评价在吸引学生、教师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媒体、报纸等也会对高校的排名进行报道和评论。……”同样,高校使用排名来选择未来的研究生。

然而,让高等教育为留学生的涌入做好准备并不简单。在德国和日本,这意味着把专业教学和活动都变成用英语进行的,即使在日本超过92%的外国留学生都是来自亚洲,其中60%来自中国,15%来自韩国。大多数日本的大学目前把重心放在研究生教育上,最初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大学“法人化”为日本的高校带来了灵活性,使得学校有可能提供特殊的终身职位和薪酬待遇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者。在一所大学中,这些特殊的学者根据表现可以获得两倍于基本工资待遇的薪水。这些学者不必懂得日语,因为他们今后都是在研究生层面教学,学生都是从其他国家来的或者具有国际化能力的。学校提供的新的基础条件包括更多的宿舍、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国际化的学生服务和设施。当日本大学的财政预算正在逐年减少1个百分点时,许多高校领导人忧心忡忡。

对经费分配的影响

竞争力和经费投入是所有国家关心的共同主题,其目的在于加强高校在学术、科研和硬件设施上的能力,以吸引留学生和国际教师。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做法。德国和日本运用市场理念和大学排名以实现大学在声誉(纵向)和功能(横向)上的分化,两国分别要建设10所和30所世界一流大学。但这可能会使一些区域和私立高校倒闭。相反,澳大利亚在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希望打造类型多样、表现出众且面向全球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品牌”。因为排名和类似的基准评估确实会影响高校的行为和表现,因此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

美国高校的国际化是否在倒退？

Kimberly Koch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国际化推进中心

电子邮箱：kim_koch@ace.nche.edu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人们或许期待看到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园国际化这一点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美国高校在国际化上的努力很不均衡。

今年5月，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总结了2006年对美国高校在推进国际化方面的政策和实施情况进行的一次调查的结果。报告的标题是《美国高校的国际化：2008版》（Map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U.S. Campuses: 2008 Edition，作者为Madeleine F. Green、Dao Luu和Beth Burris）。该报告是继2001年调研之后的第二次调研的成果。这些报告是有关美国高校国际化的唯一全面的数据来源。2006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对2,746所高校进行了调查，整体应答率为39%。报告突出了2006年的数据情况，尽量与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报告中包括所有受访者以及不同类型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授予硕士学位的学院和大学、授予学士学位的学院以及授予协士学位的学院）的调研结果。研究中出现的数据常常令人惊讶，反映出尽管有一小部分令人欣喜的趋势出现，但学校的领导者还是需要在国际化方面再次集中精力。

多数高校不重视

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对国际化的承诺不多。2006年，仅39%的高校在其学校使命的陈述中特别提到了国际化或全球化教育，34%的高校将国际化或全球化列入学校的五大优先战略中（尽管比2001年的28%已经有所上升）。44%的高校建立了专门推进学校国际化的队伍，超过一半（52%）的高校通过在其招生宣传中强调国际化或全球化的教育项目和机会来突出国际化的作用。只有23%的高校制定了解决全校范围内国际化问题的

单独规划。虽然使命陈述和战略规划都只是国际化努力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目标的确切阐释、建立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战略，对于广泛而深层次的变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毕业生的要求有限

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贸易的扩大以及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使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有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掌握其他语言。尽管这一需求很迫切，但是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习作为必修课还远未普及。在被调查的所有高校中，只有23%的学校在入学要求中有外语项目，相对于2001年的2%有所增长。对所有或部分本科生有外语毕业要求的高校比例由2001年的53%下降到了2006年的45%。2006年，只有不到1/5（16%）的高校对所有本科生都有外语毕业要求。

此外，美国教育委员会发现在通识教育中要求开设一门聚焦国际化或全球化课程的高校减少了，占高校总数的比例从2001年的41%下降到了2006年的37%。在有这一要求的高校中，要求开设“非西方”课程的比例从2001年的62%下降到了2006年的5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高校在这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授予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的高校中，一半以上都有这样的通识教育要求；有此类要求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高校中，一半以上要求开设两门或者两门以上聚焦全球的课程。

海外分校和教育项目数量少

尽管媒体对于在中东地区建立高知名度的分校以及与中印合作颁发学位的报道铺天盖地，事实上美国很少有高校这么做。美国

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所有对调查作出回应的高校中,8%在国外提供此类项目,其中又以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居多。在海外开展教育的高校中,大约 2/5 是通过分校的形式开展全部或部分教育活动的。这些项目大部分在中国(40%)或西欧(30%),主要在商业/管理专业(64%)。

并不都是坏消息……

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现提供海外学习机会的高校剧增,从2001年的65%上升到2006年的91%。更多的高校还提供海外实习机会(从2001年的9%增长到2006年的31%)、国际服务机会(从11%增长到24%)以到国外进行野外实习(从7%增长到29%)。此外,美国教育委员会还发现高校通过建立指南的方式支持海外教育,从而保证本科生可以参与合法的海外教育项目且不会因此推迟毕业。相对于2001年56%的比例,2006年已经有62%的高校建立了该类指南。然而参与此类项目的学生比例仍然很低:27%的高校说2005年的毕业生都没有参加过海外学习项目,46%的高校称2005年的

毕业生中只有5%有国外学习经历。

高校还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资金,让教师参与国际科研和交流。相对于2001年的46%,2006年有58%的高校支持教师开展留学项目。同样,支持教师参加国际会议的高校比例也从2001年的46%上升到了2006年的56%。更多的高校赞助教师到海外进修和从事科研(从2001年的27%上升到2006年的39%)。越来越多的高校为教师提供提高外语能力的机会(从2001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36%)。通过美国教育委员会与高校的直接接触经验和有关国际化的文献都可以发现,教师在推动学校国际化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高校在教师国际化方面所作的投资努力,必然会对课程的国际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高校在全面国际化方面进展缓慢且不均衡。虽然调查的数据反映的并非全貌,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校的政策和实践还没能赶上国际化的口号。总之,国际化在大多数高校还没有成气候;相对于帮助学生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来讲,国际化不仅不够深入,而且不够普遍。

跨界高等教育的私有属性

Jason E. Lane, Kevin Kinser

Jason Lane: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jlane@albany.edu

Kevin Kinser: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系副教授; 电子邮件: kkinser@albany.edu

很多人都注意到, 学生、教师和课程层面相对便利的国际流动促进了跨界高等教育的增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支持私人从事教育, 并且鼓励新的外国机构来提供教育。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尤其是营利性机构, 明显觊觎跨界市场。尽管如此, 公立高校一直是并且将继续是跨界高等教育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在国外, 这些公立高校几乎都是作为私立机构在运作的, 并且在法律上也被视为私立机构。确实, 在国外开办的高校大部分主要通过学杂费进行运作, 通常既没有得到自己祖国也没有得到东道国的资助。

非地区性(Nonendemic)的学术机构

在生态学中, 地区性有机体指的是某个地区所特有、经常受地域环境限制的本土物种。同样地, 公立高校也是各州特定政策环境中的特有产物。然而, 在其他地区建立校园的跨界公立高等教育是独立于其本土政治经济环境而存在的。他们建立了跨界的非地区性学术机构, 给东道国带去了新鲜事物。

我们最初使用“地区性(endemism)”来描述美国国内的跨界项目。有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 很多由州政府支持的公立高校在其他州建立了分支机构, 比如中密西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和特洛伊大学(阿拉巴马州)。这些分支教育机构在新的州是作为私立机构接受监管的, 几乎不受其主校区所在州的监管。这种双重监管方式意味着, 这些公立高校的分支机构在其他州作为私立机构被监管时, 更易于开拓新市场。

全球范围内的跨界高等教育好像出现了

类似的情况。发达国家的高校并没有在自己国内扩张, 而是转移到监管更少、竞争更不激烈的发展中国家去发展。正如丹尼尔·列维(Daniel C. Levy)很早以前指出的, 大多数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所接受的监管都很有有限, 政府经常预料不到私立教育的增长。这一趋势导致难以预测非地区性新高校进驻后会如何影响现有的教育结构、政策和能力。

事实上, 很多国家积极鼓励外国高校在自己国内提供高等教育, 而没有从政策上区分其是公立还是私立机构。例如, 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引入其他国家的公立高校在迪拜酋长国境内开设教育项目, 并授权它们像自治的私立机构一样运作。这些外国高校对该国现存监管体制的影响还不确定, 但是这可能预示着其他国家出现的高校新形式所导致的结果也会在迪拜出现。

跨界高等教育的监管

在跨界教育中, 国外教育机构可能会扰乱东道国现存的政策环境, 致使其监管机制失衡。比如说在迪拜, 跨界教育政策可能把这些外国公立高校的分支机构当作是私立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事实上, 由于这些分支机构与其国内的公立母校保持着联系, 因此在东道国的私立高校中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有屏障阻止本国的经费或者其他资源直接支持跨界教育, 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就是这样做的, 但外国高校的分支机构也可以从其母校的品牌认可度以及管理系统中受益。此外, 这些分支机构来自某一被认可国家的事实为其提供了可信度和质量保证(无论真假与否), 这些都是东道国私立高校无法享有的

好处。

跨界监管措施可能会假定外国学术机构作为公立机构，其跨界行为受其母校所在国政府的担保。事实上，这些组织可能会在几乎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不牵涉政府资源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对美国国内跨界教育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情况，据说全世界的跨界教育都一样。当两边的政府都认为对方（或者国内的某一机构）在进行监管，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方在进行有效监管时，这些分支机构可能会因为在质量保证方面缺乏监管而失败。

在东道国与外国高校所缔结的条约中，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外国高校所在国政府无论是否在这些跨界活动中直接投入经费，都具有对全部活动进行监管的资格。东道国允许他国政府的机构在其国内运作，并把该机构看作是非政府组织。参与东道国的高等教育可能是外国高校所在国的政府出于对本国政治的考虑，这可能会与跨界活动表面上的私

有属性产生矛盾。例如，外国高校所在国的政府可能会质疑公立高校参与其他国家能力建设的正当性。出于国家安全或提防竞争对手的考虑，外国高校所在国的政府甚至可能会限制或者强制它们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新的问题

以传统眼光把跨界高等教育作为私立机构来考量未免把其性质过于简单化。即使它们是在私立高等教育的框架内运作，作为私立机构受到监管，但是作为公共政府的延伸物，很多跨界高等教育的尝试都对这些机构的角色及其运作提出了新问题。这些跨界机构真的是独立机构吗？母国政府的政治纲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跨界项目的运作？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以便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

牙买加的发展目标与其《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

Terence Frater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教育学博士

电子邮箱: tfrater@oise.utoronto.ca

作为加勒比海地区一个债台高筑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牙买加正深受高居不下的暴力犯罪、超过13%的失业率、70%以上的毕业生移民以及人均GDP处于本地区末端的折磨。不少人认为,高等教育这样一个与知识创造、社会流动、经济增长特别有关的领域,可以在满足国家的发展需求、克服社会和经济缺陷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高等教育目前是与贸易自由化联系最紧密的领域,正超越国界进行最大规模的扩张。牙买加的高等教育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已由最初的师范院校和神学院发展到如今这样一个包括公私立大学、学院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复杂体系,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跨国教育机构也越来越多。

随着冷战结束后政治地理形式的改变以及自由贸易越来越多地被接受,建立更加有效的高等教育政策机制、不断提高驾驭全球复杂态势的能力,对牙买加来说尤为迫切。然而,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建立以及教育领域的自由化趋势,让人担心像牙买加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将无法实施与其发展目标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

牙买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

1994年,牙买加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将高等教育纳入其《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具体承诺单》中。通过这样的形式,它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承担起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政策措施上要尊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治理。对牙买加执政官员、反对派政治家、资深教育和贸易政策制定者的访谈表明,谈判代表没有进行任何咨询就能够凭借自己在处理其他经济行业方面的经验和信念制定高等教育开放议程。当时,不存在任何引发谈

判代表与教育利益相关者对话的活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好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文化的影响,也受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需求的影响。

牙买加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世界各地,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贸易自由化趋势做出反应都相当晚。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是与市场绝缘的。因此,贸易谈判代表基于自己的认识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承诺,他们的认识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入学机会、提高教育质量。

牙买加的贸易政策制定者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把本国的高等教育定位为出口行业提供了机会。他们提议将该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以英语授课的高等教育推销给拉丁美洲的学生,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自己的高等教育推销给亚洲学生一样。这些决策制定者还认为移民他国的牙买加毕业生以汇款的方式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较少考虑自由化和世贸组织的潜在威胁。

然而,从该协议生效到成为公共争论内容的近10年时间里,教育利益相关者对其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现在认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无论对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来说,还是对为了保证其质量而引进的保证措施而言,都是一种威胁。此外,他们极为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国外证书的提供会加剧移民问题。然而,对于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潜在功能被接受了。

政府官员和反对派政治家也非常震惊,他们质疑谈判代表没有进行咨询就制定以系统的教育或发展战略为基础的高等教育承诺的能力。他们关注牙买加为满足其发展目标而对高等教育进行监管的自由。政府官员在出席国际论坛时,大谈区分富国和穷国的“知

识鸿沟”，列举与人力资本和财政资源优越的国家进行沟通的艰难。尽管如此，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贸易及教育利益相关者都没有建议撤销这些承诺。因此，他们呼吁加强对话，以确保牙买加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以保持。

小结

牙买加现在认识到教育政策必须客观地平衡知识创造与国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因素。这一过程需要各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对话，以便把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的模式、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联系起来。政策制定者承认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去把握机会、排除《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高等教育造成的威胁，缺少引发并支持教育利益相关者与贸易谈判代表之间进行必要对话的过程。牙买加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高等教育承诺与本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

中国的跨国教育：挑战、关键问题和成功策略

Robin Matross Helms

国际教育咨询专家（美国华盛顿）

电子邮箱：robin.m.helms@gmail.com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正成为跨国教育投资的热土。通过创建学生交换项目和双联项目（twinning programs）、建立学习中心和分校，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都热切地寻求在利润丰厚且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

然而，当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想在中国市场上一试身手时，有报道却指出，在中国建立并运营一个成功的分校或教育项目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监管、文化和后勤方面的挑战比比皆是，包括了解全国和各省的要求、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和网络，以及找到合适的校园教学设施等。

为了对中国市场上跨国教育机构的前景、进入中国市场的利与弊以及它们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obhe.ac.uk/>）委托我对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三个不同机构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分别是美国的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和斯坦福职业发展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以及加拿大枫华国际教育投资集团商业科技学院（CIBT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我对这三个机构的校领导都进行了访谈，访谈的问题包括跨国教育的关键问题、最严峻的挑战以及获得成功的战略。

监管问题和认证

中国对跨国教育机构的监管工作由一整套密切相关的国家、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法规与政策组成，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各省市的解释和实施不完全相同。受访的校领导指出了三条对外国机构来说最关键的法规。第一，所有授予学位的跨国教育项目都必须与

一所中国高校合作进行。第二，营利不能是这些机构的目标（这条法规本身并不完全清晰，但主导性的解释好像是这样的）。第三，跨国机构要服从各省与地方的多项法规，合作的中方机构在这方面经常处理得非常好。

中国的法规还规定，在中国开展的跨国教育项目必须得到跨国教育机构总部所在国相关认证机构的认证。受访的校领导都强调与这些认证机构进行积极接触的重要性，也就是邀请它们到中国参观项目的运营、保持透明度，以确保其机构总部的认证和学术声誉受到保护。

合作机构

受访的校领导都认为选择一个合适的中方合作机构非常重要，关键的因素是潜在合作方的声誉和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对高等教育有充分的需求，并且有足够的、能负担高昂学费的生源）。此外，中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方式也应该是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们必须灵活、开放且愿意为合作项目提供必要的便利。

中方合作机构的首要作用是提供基础设施，包括教室、宿舍、食堂、办公室以及运营支持，比如获得相关的许可证、应对检查等。然而，受访的校领导都建议要保持对学术事务的最终控制，以便保护其本土总部的声誉和认证。

这些校领导还提到，最大的挑战经常出现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比如，双方的协商和管理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翻译过程的细微差别会导致歧义，交换双方批阅的文件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花时间构建坚实的合作关系和沟通渠道、经常面对面地交流，能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师资

被研究的这三个机构都既雇用外籍教师（通常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一般都来自本国的总部）和中国当地的教师。拥有外籍教师是这些跨国教育项目的特殊优势，是许多中国学生选择这些机构的重要原因。然而，受访的校领导指出，找到愿意并且能够长期待在中国的优秀外籍教师经常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甚至那些愿意在中国生活的教师，也受到诸如维持科研项目和家庭义务等问题的妨碍而无法这样做。

被研究的三个机构都创造性地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也就是为这些外籍教师做好安排，不要求他们长期待在中国。总体上讲，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压缩面对面的授课，再辅用以视频和电子邮件与学生联系沟通的方式。中国当地的教学助手也可能参与教学，为课程体系和内容注入本土的元素。

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

在这三个机构中，课程体系、授课语言和教学方法方面的“西方性（Western-ness）”是它们与中国当地教育机构不同的关键因素。打算到中国办学的外国教育机构应认真评价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通过开发相关的教育项目和课程建立自己独特的市场。比如，斯坦福职业发展中心所提供的教育项目就利用了斯坦福优秀教师在工程和环境政策领域的知识和声誉。英语授课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一位受访的校领导推测说，该校的许多学生认为就英语授课这一点花这些学费也是值得的，哪怕最终没有得到学位。

受访的校领导指出，虽然采用西方的教学方式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重大的挑战，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但这三个机构还是都

采用了西方的方式。中国的课堂教学方式一般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主要是记忆和重复，突然要求学生从被动地听讲转变为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辩论，使得学生非常不自在。但是中国学生能够而且也确实适应了西方的教学方式，不过可能需要些时间与帮助。就像一位校领导所讲的那样，关键是创造一种“挑战教师和同学无伤大雅”的氛围。

未来的前景

2006年，中国政府决定控制高等教育的增长；据推测，接下来很可能对外国教育机构采用更严厉的政策和不太有利的态度。虽然如此，显然仍存在大量的机会。一位受访的校领导估计，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目前只有20-30%被满足。与印度等其他未被开发的市场相比，中国在高等教育增长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且伴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些人正是教育消费的主体。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饱和。

总体上讲，外国教育机构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只能留待时间来解答，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将不断变化。然而，根据本次所研究的这三个机构以及中国市场上其他外国教育机构的经验，某些机构显然非常有可能在中国获得良好的发展并取得成功，即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外国机构总部的优势并与声誉良好的中方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真正致力于提供高水平的教育，并且有耐心经受重重考验的分校和教育项目。

作者注：本文根据作者为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所撰写的一份报告整理而来。

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Osman Ozturgut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育学院

电子邮箱: osmanhoca@hotmail.com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批准了中外合作办学,以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使之实现现代化。2003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721所已获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机构。合作形式从共同建立新的教育机构到在中国现有大学中授予外国学位。

中国政府强调,这种合作办学机构应提供优质的国外教育资源。然而,由于几乎没有相应的项目评估或严格的认证措施,合作办学机构教育项目的质量受到了质疑。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大部分项目也要接受国外大学所在国的认证,然而中国对这些项目的质量几乎没有持续的监督。

当前的问题

在这种合作办学分校中就读的中国学生,大部分都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但在全国高考中却遭到了淘汰。没有被中国大学录取的学生必须寻找其他出路。这种合作办学机构以相对较低的入学门槛为这些学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入学的唯一要求是高中毕业,并能支付学费。

入学后,不能证明自己熟练掌握英语的学生,第一学年会被安排在语言强化班学习一个学期。期待学生通过这种有限的培训能够阅读并理解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和其他专业的英文教科书是不现实的,但对于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些西方的教育机构担心因中国学生感到丢脸而导致学费收入的降低,因此允许学生没有掌握基本的英语能力就可以毕业,更不用说专业领域的的能力。

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质疑从所谓的西方著名大学获得的文凭的价值。此外,一些分校现在利用当地教师进行中文授课,所以并非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英语。

在教师方面,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找到合格的、有经验的、并且愿意来中国执教的外国教师,即使只来一个学期。合作办学机构提供很低的薪水,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或者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来中国任教的外国人主要包括来享受带薪假期的退休教师、在正式进入学术界之前寻找实践经验的教师或者在别处无法找到体面工作的人。虽然来中国执教的教授可能有其他的正当理由,但大部分超过一年的人是因为在本国缺乏就业前景或者是退休后想在中国安家落户。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则是因为更多的人道主义承诺:把西方最好的东西带到发展中国家。

这些合作办学机构的教学质量已经受到极大关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外国教师几乎没有受过有关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培训,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甚至可能没有任何学术资格。在中国教授英语的资格和技能要求很简单: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西方人)。如果你满足这些条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大门将为你敞开,并提供心理、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你可以假装非常喜欢,享受一种伟大的文化,并把一些钱用来还助学贷款和汽车贷款。然而,真正合格的教师会因为行政机构要求他在学生“作弊”、“上课睡觉”、“经常旷课”以及“不交作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感到相当沮丧。也就是说,让不合格的学生获得学分在这种办学机构是正常的。

小结

当然,虽然在进行合作办学时面临着中国学生英语水平低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挑战,但一些中国的高校确实在努力提供最高质量的教育。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仅举几例）已经与国外大学建立了若干合作关系，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的增加，它们正在用积极的营销战略招收学生。有些管理者降低了入学标准。教师在教学中降低对学生的期望值。如果分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做的不好，那么总校就会对其进行指责，往

往不考虑为了运行该项目所做出的牺牲。这样的合作办学机构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遭遇失败，而且不营利。一些机构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教学。鉴于学生英语能力的缺乏以及学校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挑战，这些机构未必能改变现状。如果它们真的重视教学质量的话，我强烈建议这样的合作办学机构停止招生，在目前的学生毕业之后就撤出中国。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Ma Xiaoying, Malcolm Abbott

Ma Xiaoying: 中国华北电力大学英语系; 电子邮箱: amxiaoying@126.com

Malcolm Abbott: 新西兰国际教育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 mjabbot@kpmg.com.au

近年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2006年, 高校在学人数达2,340万人(包括公立与私立高校、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学生), 规模居世界第一。尽管取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类似的许多国家相比并不高。因此, 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在未来几年中还将继续扩大。

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

据估计, 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为5,300美元, 高于印度的2,700美元和印度尼西亚的3,700美元, 但是低于南非的9,700美元、泰国的7,900美元和巴西的9,700美元。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median age)为32.7岁, 虽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但是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此外, 虽然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类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略高于10%), 但工业所占比重较高, 而服务业的比重相当低。

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接受教育。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对毕业生的需求。劳动力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 需要具备工程以及相关技能。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对毕业生的需求, 并促进高等教育为商业、信息技术以及相关领域培养人才。

在中国, 收入的增加以及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意味着毕业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快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引起了对毕业生质量和就业能力的关注。缺乏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 影响先进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每年培养60万新工程师, 大约是美国的9倍, 但160万的年轻工程师中只有大概16万人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专业和语言技能。尽管毕业生的数量增

长强劲, 但服务性产业在中国却难以发展。因此, 与许国国家相比,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快扩张的过程中, 面临着一些困难。

毛入学率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6.4%上升为2006年的21.6%。事实上,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从精英型教育转变为了大众化教育。同时, 中学教育入学率的增长尽管有所放缓, 但仍稳步上升, 从1999年的62%增长到2006年的76%。这一增长比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比如美国(95%)、日本(100%)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85%), 但在发展中国家很有代表性, 与马来西亚(70%)、哥伦比亚(82%)和泰国(78%)处于类似的水平。

我的推论是, 如果中国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 或者完全从发展中国家转型到发达国家, 那么这个增长速度还可能继续上升。总体来说, 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保持稳定之前, 仍将继续平稳上升至90%左右。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差别很大, 但是与大部分国家相比, 中国的比例相对偏低。中国的毛入学率为21.6%,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比如日本的57.3%、美国的81.8%和中国香港的33%; 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比如马来西亚的39%、哥伦比亚的30.8%以及泰国的45.9%。如此看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未来还将继续扩大规模, 也许速度不如过去几年那么快, 但也会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率。唯一的制约因素很可能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在将来的某个时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可能会放缓。但在此之前，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毛入学率的上升仍然会同时作用于高等教育体系，使其进一步扩大。

海外留学生人数

根据2006年的数据，海外留学生（不包括欧盟内部学生）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出国留学的原因包括希望移居国外、被名校吸引或者在本国缺乏教育机会。在15-25岁这一年龄段，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与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比值为0.38%。相对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一比例并不特别高，比如日本是0.82%、中国香港7.59%、马来西亚1.84%、泰国0.45%、印度

尼西亚0.16%。从以上数字中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信息，只能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很多，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这一比率并不是特别高。因此可以预计，中国学生未来仍将是最大的出国留学群体，除非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比例发生巨大变化。

小结

中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的高速发展势头未来仍将继续。但这样的趋势并不能完全避免毕业生质量以及就业能力问题。第二个重点是，虽然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在未来的增长势头可能会放缓，但他们仍是海外留学群体中规模最大的。

印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谨防特洛伊木马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印度议会经常被指责不作为或办事拖沓。《外国教育法》(Foreign Education Bill)因为联合政府的执政分歧被拖了2年,却在某种意义上说明这种拖沓可能是件好事。印度的高等教育政策对于国家来说极其重要,也与很多想在印度设立分校的外国大学密切相关。据印度媒体报道,40所外国大学向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政府征用孟买-普那-纳什克地区(Mumbai-Pune-Nashik)的土地来设立分校。这些趋势只是外国机构对印度庞大而利润丰厚的教育市场充满兴趣的证据之一。一些外国大学已经在印度运营,大部分都是通过与印度大学合作的方式进行的。

对外国大学来讲,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市场。这个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目前只有10%的适龄人口进入大学学习,是中国毛入学率的一半,远远低于大部分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此外,印度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也有待满足。印度现有的顶级高校数量极少,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等,与需求比起来微不足道。因此外国大学从印度这个市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谨慎对待外国教育机构

一些把高等教育仅仅看作是一种可以全世界买卖的商品的利益相关者,赞成对所有的教育产品都毫无限制地打开国门。诸如英国和美国等教育出口国家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许多私立大学、国际考试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政府机构,都持有上述观点。坚信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商品的人对大学和学术专业的引进和出口热潮表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学术工作关系到公民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类似于“公共利益”的目标,而这

些常常被进出口商完全忽视。商人只对出售有直接需求的产品有兴趣,比如管理学课程,而对继续研究型大学、提高服务度不足群体(underserved communities)的入学机会和平等等毫无兴趣。

为什么外国大学和教育公司,比如罗瑞特教育集团(Laureate Education Inc.)希望进入印度市场?他们的动机很复杂,但是理解这些动机很重要。有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每个进入印度市场的人都希望赚钱,主要通过紧俏专业提供教育项目。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国机构对投资费用高昂的学术基础设施,比如科学实验室和研究设备都没有兴趣。像所有的公司一样,他们希望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制定了通过高等教育出口获取利润的国家政策。因此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都会协助英国教育机构将其出口潜力最大化。英国文化协会不再主要提供教育信息,而是致力于促进教育出口。

美国在某些方面虽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模式。美国没有全国性的高等教育政策,主要由50个州自己负责制定高等教育政策,但没有一个州宣布高等教育具有出口优先权。与英国和澳大利亚不同,美国拥有强大的私立高等教育,私立大学和学院在教育出口方面最积极主动。欲进入印度市场寻求丰厚利润的机构可能将以低端私立学校为主。

美国的营利性高等教育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最大的两家是罗瑞特教育集团和阿波罗集团(凤凰城大学等高校的所有者)。罗瑞特集团的策略是收购美国以外的现有大学(在三个大洲拥有29所高校)或者建立新的学校。罗瑞特集团曾在对待外国机构较为友

好的印度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 建立了一所大学, 但是当监管环境过于复杂时就退出了。

占美国 3,000 多所高校 20% 左右的顶尖私立和公立大学, 对于进入印度市场有着复杂的动机。其中大部分高校都对国际化真的有兴趣, 在经济和教育方面把印度看作是 21 世纪重要的一员。他们看重自己的“品牌形象”, 希望在最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场之一的印度扩大影响。他们可能会利用在印度的分支机构招募聪明的印度学生和学术人员到美国学习。而这些高校位于印度的分校则可以为美国的师生提供学习和研究场所。当然,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学都想通过在印度提供教育而获取利润。

对于印度来讲, 有问题的是处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底部的大量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高校。这些学校可能会着力于进入印度市场, 根本的原因是想在印度赚钱。虽然其中的很多高校会提供质量不错的学术项目, 但是也不乏有人试图偷工减料。审核和监管这些高校并不容易。备受推崇的美国认证体系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要一所高校获得了认证 (美国的认证并不是衡量质量高低, 而是衡量是否达到最低标准), 其办学质量就无人问津了。这些高校将在印度提供他们觉得可以吸引学生的项目, 但是对于是否在印度长期开展教学或保持良好的质量, 很可能几乎没有任何承诺。

外国高校分支机构的基本问题

在印度认真考虑有关允许外国高校进入国内的政策时, 必须解决一些核心问题。外国高校的动机是什么? 有关外国高校分支机构的一切是否都透明、公开? 该高校在其本国处于什么地位? 外国高校是否能够在印度提供与其本国一样的教学质量, 这一水平在其本国是否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外国高校是否能够用自己的教师在印度开展教学活动, 是否配备适当的基础设施, 比如图书馆、电子学习设施以及实验室? 外国高校是否能够在印度长期维持教学?

允许外国高校在印度设立分校并不是印度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化的唯一道路。双联项目、联合学位、学生和教授交换、课程共享等都是可行的, 更有可能保证印度从根本上控制本国的高等教育。

迄今为止, 印度对于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大量的留学生, 其中很多人没有再回印度。印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更加互动, 但是不能以牺牲学术主权为代价。毕竟高等教育并不是纯粹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商品。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财富, 是国家未来繁荣的关键。

作者注: 该文章曾刊登在 2008 年 7 月 15 日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Chennai, India) 上。

印度理工学院的种姓、阶层与质量

Asha Gupta

印度德里大学 (University of Delhi)

电子邮箱: ashagupta3452@gmail.com

印度理工学院是按照国会的一项法案而建立的,受中央政府资助,在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进入印度理工学院必须通过每年一次的联合入学考试。每年大约有30万考生竞争3,000个入学名额。虽然要想考入印度理工学院非常困难,但仍是大家追捧的对象。

目前,7位印度理工学院的校长与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就2008年6月9日出台的学生入学名额分配命令产生了冲突,该指令要求这些学校从2008/09学年开始,将各院系学生入学名额的15%预留给特定种姓,7.5%预留给特定部落,27%预留给其他弱势阶层。通常“其他弱势阶层”指的是社会地位不高、缺乏教育的社会阶层。根据1931年按种姓进行的人口普查,印度有2,399个地位低下的种姓或族群。

虽然从1973年起就开始实施了为特定种姓和部落的学生预留入学名额的政策,但是执政的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政府在2005年仍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把预留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除少数几所高校外的其他所有中央政府资助高校的讲师和教授职位。为了给预留政策铺平道路,在2005年12月通过了第93号宪法修正案。2006年1月《中央教育机构(入学预留)法案》[Centr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eservations in Admissions) Act]正式生效,要求包括印度理工学院在内的所有中央资助高校必须为其他弱势阶层保留27%的入学名额。2008年6月9日的命令要求把预留范围扩大到教师的聘用上。

所有的印度理工学院都为特定种姓和阶层的学生预留入学名额。他们同样也预留从初级职员直至教务长的行政管理岗位。现

在又要求他们把理工科的讲师和副教授乃至管理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教授岗位预留出来。

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会有教师利用种姓因素进入著名的精英型印度理工学院。虽然人力资源开发部主管技术教育的主任希玛·瑞贾(Seema Raj)按照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建议,签署了相关命令,但是许多教师认为这项命令是人力资源开发部强加于印度理工学院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像这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事务应该首先在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内部进行讨论,但这一次没有征询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就做出了决策。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部则认为印度理工学院一直试图绕过预留政策,尽管这些学校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豁免权。

对预留政策的保留意见

印度理工学院的校长们对教师在聘用方面也实行预留政策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应该撤销这个决定。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Bhabha Atomic Research Center)和哈里什·钱德拉研究所(Harish Chandra Research Institute)因为是“国家重点研究所”可以不实行预留政策,但是与它们至少齐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却被强制要求执行这项政策。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理工科仅仅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实行预留政策,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要在讲师至教授的所有岗位实行预留政策?这样的差别似乎是传统思维的结果,尽管印度理工学院正试图通过设置更多硕士与博士层面的跨学科专业来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

在印度许许多多表现平平的高校中,印

度理工学院仍是为数不多的卓越学术中心之一。除了学校的教师，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和在读学生都对为特定人员预留教师工作岗位的做法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印度理工学院的声誉包括了由优秀的教师提供的高水平教学。在他们看来，教师职位的预留政策看上去就是一个出于政治原因推行的决策，将会严重损害学生的利益。

目前，印度理工学院缺乏大约 900 名左右的合格教师。在政府的 2007-2012 五年规划中，计划新建 10 所印度理工学院或印度管理学院，以促进印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教育。预留教师职位的政策很有可能降低教学和科研的标准，而不是激励学校建立更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政策目标

预留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在印度这样一

个受尽种姓制度迫害的等级社会中，寻找一些措施和方法来为那些因处于社会和教育弱势地位的贫困人群提供社会公平和经济机会是完全可取的。通常来说，实施预留政策是为了赢得被边缘化的和未被充分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持，预留名额或配额都被看作是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重要工具。

平权行动是开放的、没有名额限制，但预留名额或配额的具体数量或比例可以是确定的，其具体数量或比例是以平等、社会公平或民主的名义确定的。在印度理工学院预留教师职位的政策可以看成是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文化、政治和心理层面中的种姓歧视现象所特有的产物。预留政策作为一项政治上的纠错举动，被认为是可以在短期内实行的措施，但肯定不是万灵药。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在公平和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美国区域性认证机构从事国际认证的经验教训

Jean Avnet Morse

美国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委员会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主席

电子邮箱: jmorse@msche.org

随着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外国高校寻求美国的认证。这是因为美国的认证提供了一种民间化、基于使命 (mission-oriented) 的模式，拥有训练有素且公正的评估者，可以被用于认证公立和私立高校。在现存的标准中，这种认证是否可能？对于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的高校和学生而言，又有着哪些利与弊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为一个高校认证机构，美国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02年实行了一个试验性项目。虽然该委员会对由美国中部地区授权的美国海外高校有着长期的认证经验，但从未认证过在国外组建的非美国模式的高校。该委员会已经认识到在国外运用美国标准时，需要对“文化帝国”的观念十分敏感，但是它仍然坚持申请者必须符合委员会的常规标准。

参加这个试验项目的9所高校都是自愿的。在认证海外高校的过程中，委员会也收集其他信息。海外高校包括参加试验项目的9所高校，以及79个会员高校分布在50个国家的330个教学点。一些高校已经完成了认证，另一些仍旧在申请过程中或候选之列。这些学校分布在加拿大、英国、智利、阿联酋、中国台湾、英属维京群岛和希腊。在了解美国审查和监控制度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包括一个很长的“候选”过程) 之后，一些高校选择了退出这个试验。所以，目前委员会停止接受新的高校。

认证标准

首要的问题是，委员会基于使命的标准在评价国外高校的具体做法时是否足够灵活。迄今为止，虽然一些高校遇到了特别的挑战，但委员会的认证标准是足够灵活的。为了满足高校要提供通识教育基本技能这项

要求，委员会承认大学预科教育也有同等功效。一些高校改变了它们的治理结构，以满足委员会认证标准中“拥有没有利益冲突的独立董事会”的要求。财务报告需要转换成美国模式。当出现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时，委员会要求高校保证具有必需的保障。委员会根据当地需求和使命解释学生支持服务的标准。

认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挑战在于一些基本的认证标准，比如具有明确的使命陈述、实现使命的细化目标、与预算挂钩的规划以及旨在改进的评估。

外部制约因素

认证中所面临的挑战超出了认证标准本身。虽然委员会并没有要求英语授课，但是认证过程中的资料都是英语的，翻译是个艰巨的任务。虽然高级管理人员经常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现场考察专家与教师、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困难。如果可能的话，认证工作人员中应有通晓多国语言的成员。

在去某个国家进行现场考察之前，委员会都会联系当地的质量保证机构，然而如果没有当地的专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机构。当地的法律和常规做法都要求认证具有灵活性。比如，有个国家的政府不给营利性高校发执照，某所高校不得不在别处注册以满足标准中所要求的有效的学术授予权。有关欧洲和其他国家三年制本科学位的问题也日益增多。

最后，委员会在“911事件”之后根据美国政府的警告或建议，采取了限制去某些地区的政策。这迫使我们取消了在某个国家的认证过程，并且创立了通过电话会议进行的虚拟考察。

美国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能力

在进行认证之前,这个项目中的所有高校都经历了申请和候选阶段。在委员会对新高校的认证过程中,需要认证工作人员、指定的咨询顾问以及两个专家组对高校进行反复考察;在可能长达5年的时间里,委员会将对高校进行两年一次的审查和考察。

这些服务和旅行需要花费认证人员大量的时间。如果委员会打算接受更多的申请者,那就需要新的认证人员在国外进行监控、执行认证标准。美国国内对认证人员的迫切需求是停止接受新认证申请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委员会从事这些工作的动机在于营利的話,我们可能会非常失望。

认证的好处

根据委员会的一份调查,外国高校指出自从它们得到认证后,更容易吸引教师和学生、转换学生的学分和学位以及与本地高校进行竞争。在有些国家,对某些或者所有类型的高校都没有进行认证。

认证过程有助于高校制定围绕着自己使命的内部目标,发展并实施产出评估,以及根据反馈再进一步提高。高校重视专家组的建议,尤其是在那些本土的认证者被认为不公正或经验不足的国家 and 地区。一些高校表示他们想要发展本校提供通识教育的能力。认证对于美国高校的益处尚未总结,但在试验开始之时委员会就列举了若干益处,包括更方便学分转换和学生转学。

随着教育的全球化,对美国高校而言应该还有额外的益处。我们的会员在国外开设了越来越多的校园,带来了更多学生的双向流动。欧洲和其他地区正在对高校和质量保证机构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美国高校持续参与国外高等教育的行动,有利于弥补不同教育系统之间的差距。

小结

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能够建立国际标准,以解决不同教育系统所面临的问题。美国认证机构也不可能孤军作战来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区域认证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外高校进行认证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出现上述认证难题的高校。美国区域认证机构也可以通过确保美国高校的海外分支机构满足与国内同样的认证标准,来帮助其他国家建立质量标准。

认证机构可以把他们的时间投入到更大范围的项目中去,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为满足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需要而建设当地质量保证体系的国际项目。鼓励地方性评估可以创建被当地所接受的体系,同时这个体系也能够给其他国家的高校和学生提供所需要的质量保证。

美国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试验项目成功地找出了各国高校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随着该项目的推进,还会得到其他信息。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可以作为质量保证机构国际合作的基础,也可以为解决最明显的差异问题提供可能。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William G. Tierney, Morshidi Sirat

William G. Tierney: 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等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wgtiern@usc.edu

Morshidi Sirat: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所主任; 电子邮箱: morshidi@usm.my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及所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 公立高等教育中的私有化不断增长; 新的教育机构已经进入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市场; 国际大学排名是政府和研究型大学所关注的要务; 学生家长、学生和政府都关心教育的成本问题。马来西亚目前正在讨论高等教育部是应该继续远距离操控公立高校, 还是应该制定一个权力更加下放计划? 媒体和老百姓所热议的话题包括: 如何停止马来西亚优秀教师的人才外流? 如何利用好回流人才? 如何为学生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需求提供服务? 如何为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提供就业机会? 等等。

增长

马来西亚公立大学中一般都是传统的适龄学生, 18-24 岁的青年人中, 约有 10% 接受高等教育, 而新成立的营利性私立高校中的成年人则稍多一些。在过去的 20 年里,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长。例如 1990 年, 约有 10 万名学生在公立高校学习, 而去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三番。目前,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已经超过 70 万人, 其中约 47% 的学生在公立高校学习, 另有 46% 的学生在非公立高校接受教育, 剩余的人则去了国外学习。

马来西亚 1985 年有 6 所公立高校, 现在则有 20 所。教育部认定其中 4 所为研究型大学。由于排名结果被视作是质量的一种象征, 所以在全球百强大学排名中没有马来西亚大学的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马来西亚政府部门想要一或两所研究型大学成为“顶尖”大学, 进入全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行列。政府的目标是到 2010 年, 至少有一所大学进入

世界百强。

除了公立大学外, 公立高校还包括理工学院 (polytechnics) 和社区学院。除联邦直辖区 (Federal Territory), 马来西亚 13 个州目前共有 24 所理工学院和 37 所社区学院。理工学院提供资格证书和学历课程, 去年共有 85,000 多名学生毕业。社区学院的学生也在不断增长, 2001 年只有 1,000 名毕业生, 而 2006 年则有 11,000 多名学生毕业。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所有 222 个议会选区里各建立 1 所社区学院。最近, 政府已经规定这些学院要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私立高等教育

尽管公立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不断扩大, 但最重要的是私立高校的增长, 既包括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私立高校, 也包括从国外引进的私立高校。1985 年只有 15,000 名学生在私立高校学习, 而如今非公立高校的学生已经超过 250,000 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马来西亚大约有 150 所私立高校, 而去年非公立高校已经超过 500 所。“非公立 (nonpublic)”这个词是刻意使用的, 因为对“私立”或“营利性”的概念界定尚不完全清晰。例如, 莫纳西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是澳大利亚的一所公立大学, 它在马来西亚开办了一所分校; 马来西亚的一些政党也帮助开办新的高校; 还有其他很多机构也提供课程和学位, 所以“私立”高校的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尽管如此, 非公立高校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略低于 50%。所有这些情况都考虑在内, 马来西亚目前共有近 750,000 名学生在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种族、民族和平权运动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人数略微超过52%；根据国家的宪法，所有马来人都是穆斯林。另外，马来西亚还有26%的华人（主要是佛教信徒），11%的土著人，8%的印度人和印度教信徒。1971年的一项法案试图扭转华人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提升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群体的平权运动。结果使在公立大学接受教育的马来人的比例有了显著增长，而在公立大学就读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则有所下降。在实行该法案之前，马来族学生占所有学生的比例不到1/3，但是到了1985年，这一比例接近2/3。与此相反的是，华人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1966年约为56%，而20年后这一数字却缩至29%。1971年法案的一个副产品是非马来族的马来西亚人（华人和印度人）开始建立本民族的私立高校，在这些高校就读的学生是私立高校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公立大学开始实行根据能力进行选拔的制度。

经费

马来西亚政府越来越希望公立高校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是单一地从政府部门获得经费。从1987年起，国家控制的大学开始法人化，为公立大学寻求另外的收入来源提供了机会。尽管政府经费的比例依然超过所有运营经费的80%，但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采取了与全世界其他高校类似的做法。这些大学正努力加快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正如澳大利亚那样，一个经费来源就是国际研究生，他们支付全额学费。结果马来西亚目前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留

学生，但还想招收更多的留学生。因为马来西亚认为，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穆斯林国家有潜力从中东和其他地方吸引大量的穆斯林学生。此外，许多课程的教学都采用英语授课，这使得马来西亚的高校能够吸引说英语的学生。中国也被东南亚国家视作留学生的一大来源国。

集权与分权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公立高校都被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过去的10年里，要求高校享有更多自主权的呼声不断增强，现任总理已经同意应该让高校拥有一点儿更多的权力。校长和教师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他们在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上有多大的自由，都还有待观察。现在的政府有点混乱，失去了2/3的选票，这在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高等教育改革还不是政府的头等要务。

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也在继续增加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所有高校拥有终极学位的教授数都不低于50%。大多数教师都是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希望拥有更多的学术或者个人自主权以及学校管理参与权，从事更多的科研。

结论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教育被认为是增加个人财富和社会经济福利的关键手段。即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人们都认为高中毕业证书不再能够保证找到好的就业岗位。因此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在特征、关注点、监管和规模等方面出现了大量变化。从这一点来看，马来西亚是一个正试图了解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生动案例。

重建阿富汗高等教育的努力

Michael Daxner

大宪章观察组织 (Magna Charta Observatory) 主席、阿富汗政府资深国际顾问

电子邮箱: michael.daxner@uni-oldenburg.de

2003年,阿富汗高等教育系统包括18所高校、34,000名在校学生,当时全国人口约为2700万。18所高校中,一半称得上是“大学”,其余都只是高等教育培训机构。然而,高水平学术教师的数量已有非同寻常的增长。从西方、伊朗、巴基斯坦回国的人员和从前苏联毕业的学生,对经历了从1976年开始的30年战争后依然幸存下来的本土教师形成了挑战。

如今,共有20所公立大学已经注册,9所私立学校正在寻求认证,而阿富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Afghanistan)自2006年开始运转。目前,阿富汗高校的在校生约10万左右,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高校接受教育。从外表来看,这个系统好像充满活力,但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它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2002年以后,阿富汗的高等教育在开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等教育部长法耶兹(Mohammad Sharif Fayez)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位部长是比较文学方面的杰出学者,因为有过流亡华盛顿的经历而了解西方。他鼓励本国和外国专家协助起草急需的法律。德国大学校长会议(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和德国学术交流署(German Organization for Academic Exchange)帮助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大学校长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与起草了一个总体规划。

激烈反应

当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拒绝签署法令、要求议会进行表决时,不幸就开始了。法耶兹被解雇,他的继任者过于保守,以至于重新回到了战争之前的法令或者复制了被前苏联占领时期的法令。尽管有国际社会的大量帮助和回国学者的巨大潜力,但各

级的反应还是很强烈。大学校长会议被停止,学生参与和自由选举校长成为历史,阿富汗将要再一次在国际高等教育界衰落下去。

公立高校在有着诸多限制的官僚制度中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前部长法耶兹现在是创建阿富汗美国大学的首任校长。为了满足对教师、中层管理人员、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需求,需要建立其他的私立高校。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得再被引入或重新发展。很多学科都要求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基本的设备仍然匮乏。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给予了援助,世界银行也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是学术自由、师生的社会保障、可持续并有效的本科教育、与国际标准之间保持互动等,目前仍很缺乏。然而许多改革者在没有政府部门帮助或批准的情况下去寻求国际支持。与国外大学进行交流以及一些援助项目成了必然的选择。有若干校园正在修缮,但是维护和基本设备缺乏的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政府部门正试图削减高校微弱的自主权和问责制。在重建5年后,现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展望

但愿学术自由的经历、优秀大学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对正在回归的教师和一些学生将产生更强的影响,而不是各种企图把宗教和其他专制影响在阿富汗全社会变得更激进的举动影响更强。道理很简单:高等教育是除新型国家军队和其他商务部门之外,唯一可以摆脱贫困、文盲和战时经济恶性循环的办法。此外,对低层次高等教育的需求一天天地强烈起来,比如社区学院和本科教育、专业和职业培训。这可能是防止塔利班武装恢

复或者阿富汗技术人才大量外流的唯一办法。

战争区域占据了阿富汗大约一半的领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安全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关心的是饮用水、能源、就业和教育问题。当然，阿富汗需要训练有素的安全部队和警察。这就是为什么也需要国际维和部队对当地警察和军队进行长时间培训的原因。然而，中学教育、教师培训以及农业、科技、社会工作和社会科学方面基

本的专业教育是最迫切需要满足的优先事项。学生宿舍（特别是女生宿舍）、教师工资、教师的社会保障以及高度参与国际事务都需要资金。

不仅在打击塔利班和武装分子的行动中，而且在社会的重建过程中，美国都承担着最重的任务，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必须分担重建阿富汗的任务。各国需要履行几年前做出的承诺，目前履行的承诺不到45%。阿富汗最需要的是物资援助和团结一致。

新书简介

Alemneh, Teshome Yizengaw. *The Ethiopian Higher Education: Creating Space for Reform.* Addis Ababa, Ethiopia: St Mary's UC Printing Press, 2007. 241 pp. 60 birr (pb). ISBN 978-99944-999-4-6. Address: POB 2283, Addis Ababa, Ethiopia.

该书聚焦于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 提供了有关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背景资料, 并且讨论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入学机会和平等、国家的作用、领导者与学校管理。

Baker, David P., and Alexander W. Wiseman, eds. *The Worldwid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ingley, UK: Emerald, 2008. 347 pp. £57.99 (hb). Address: Emerald Publishers, Howar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BC16 1WA, UK. ISBN 978-0-7623-1487-4.

该书包括一系列以高等教育转型为主题的论文, 讨论的内容包括世界大学排名、腐败、研究型大学的作用、韩国在校生规模的扩张、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学术市场中的作用。

Ewell, Peter T. *U.S. Accredi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Quality Assurance.*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2008. 199 pp. \$29.95 (pb). ISBN Web site: www.chea.org.

该书对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的发展历史、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挑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对那些关注美国复杂的认证体制的国际读者很有价值。

Glazer-Raymo, Judith, ed. *Unfinished Agendas: New and Continuing Gender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9 pp. (pb). ISBN 978-0-8018-8863-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分别讨论了女性教授、管理者和学生的作用。书中对数学专业的女学生、校务委员会中的女性成员和女校长的作用以及教师的绩效与性别等主题进行了个案研究。

Gupta, Asha.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Looking Beyond University.* Delhi, India: Shipra Publications, 2008. 319 pp. Rs. 750, \$40 (hb). ISBN 978-81-7541-406-8. Web site: www.shiprapublications.com.

该书对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包括私立高等教育与私有化(若干章内容都聚焦于该主题), 技术的作用、职业化以及印度高等教育未来可能的趋势等。

Gupta, Asha, Daniel C. Levy, and K. B. Powar, ed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 and Indian Perspectives.* Delhi, India: Shipra Publications, 2008. 306 pp. Rs. 695, \$35 (hb). ISBN 978-81-7541-385-6. Web site: www.shiprapublications.com.

该书包括一系列关于印度私立高等教育以及私立高等教育国际比较的论文, 其中近一半的章节都聚焦于印度。所关注的其他国家还有南非、泰国、美国和日本。讨论的内

容包括质量保证与私立高等教育、司法干预和私立医学教育。

Martin, Michaela, ed.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Regul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Impact. Vols. 1 and 2.* 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2007. 331 pp. and 348 pp. (pb). ISBN 978-92-803-1302-9 and 978-92-803-1303-1. Web site: www.unesco.org/iiep.

这部两卷本的专著聚焦于跨境高等教育中的监管和质量保证问题，这两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多关注。书中包括对智利、阿曼、菲律宾、南非、阿根廷、肯尼亚和俄罗斯的案例研究。这些研究突显了许多国家在应对跨境高等教育时所采用的不同监管路径和面临的问题。

Morley, Louise. *Gender Equity in Commonwealth Higher Edu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Sustainable Interventions in Selected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6. 150 pp. (pb). ISBN 65-1-86192-761-4. Web site: www.dfid.gov.uk.

该书综合总揽了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提高性别平等的努力，对艾滋病教育、平权行动计划和政府的政策进行了研究。

O'Neil, Robert.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Wired World: Political Extremism,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12 pp. (hb)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ISBN 978-0-674-02660-5.

作为美国主张学术自由的最著名学者之一，该书的作者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21世纪的大学所面临的学术自由问题。书中讨论了新技术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危难时期（如“9.11事件”之后）的学术自由、学者的权利、《美国宪法》与立法机关的作用等相关主题。虽然书中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美国的情况，但是该书对全世界都有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1, No. 4, November, 2008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3, Fall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Issues

Academic Career Structures: Bad Ideas.....1

Degree Mills: A Silent Crisis

Degree Mills: The Impact on Students and Society.....3

When Criminals Contro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5

Clipping the Wings of Degree Mills in Nigeria.....7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ankings.....9

Internalization in the U.S.: Slipping Backward?.....11

The Private Nature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13

Jamaica's Policy Toward GATS.....15

Chin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17

Joint Venture Campuses in China.....19

China's Tertiary Education Expansion.....21

Indian Trends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23

Caste, Class, and Quality at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US Regional Accreditation Abroad.....27

Malaysian Challenges.....29

Efforts to Reconstruct Afghan Higher Education.....31

New Publications.....33